

“大丈夫”终究是一种情怀、一种精神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大丈夫”甚至可以和性别无关。

女性也可以是“大丈夫”

□林少华

【文化杂谈】

讲课也好、讲演也好，我每每讲到孤独，讲守护孤独如何重要。的确，守护孤独在当今之世尤其重要和必要。也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处于艰难的转型期，说得极端些，腐败、各种“潜规则”的普及性、完备性、技巧性恐怕是其他文明、其他像样些的国家所不敢想象、更不能达到的。对于钞票、豪宅、名车、酒色以至奢侈品的迷恋，几乎达到了马克思所抨击的“拜物教”的地步。对于各种物质享受、各种低级趣味的娱乐活动的追求，也只能让人想起美国尼尔·波兹曼所写的“娱乐至死”。

君不见，大小民营书店接连倒闭，社区图书馆门可罗雀，而五花八门形迹可疑的洗浴中心、洗脚房或足疗馆却张灯结彩，一片欢声笑语。在这种世风世况之下，守护一份孤独就变得分外难能可贵。至少

这样可以使我们洁身自好，“质本洁来还洁去”。

但是，任何东西都有正负两个方面，孤独也不例外。如果过于孤独自守，未尝没有可能陷入病态的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自满自恋甚至自闭状态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爱情可能发自自卑，而孤独更与傲慢有关，或者说是一种精神优越感。而若过于欣赏这种优越感，孤独就有可能成为逃避现实困难、逃避社会责任的精神避难所。不用说，这是消极的颓唐的卑微的渺小的隐士的孤独。我们不能永远像村上作品主人公那样坐在若明若暗的酒吧里半喝不喝地斜举着威士忌酒杯，不能对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熟视无睹、安之若素，逆来顺受，不能沦为鲁迅深恶痛绝的那种人：“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这意味着，无论作为社会整体还是作为公民个体，现在都应该有一分清醒：在物欲横流泥沙俱下的大潮中守护孤独诚然难能可贵，但不能在此止步，更不能为此自命不凡，而应该鼓足勇气，超越孤独，进入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大丈夫”精神境界。

换言之，静夜烛光孤独自守的清高和雅兴固然不可或缺，但不能因此忘却了黄钟大吕天风海涛的阳刚世界，那里生成的才是民族魂、民族的脊梁。尤其当下，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相当强大。2011年经济总量就已接近七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逾3万亿美元，至今仍居世界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5%，人均GDP也已超过五万美元，京沪已轻松过万。北京2011年人均12447美元，超过12276美元“标准线”，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与此同时，中

国已进入进一步改革的深水区，一个何去何从的大时代已经降临，再不能蜷缩在孤独和矫情的“小时代”和历史空洞化的“幻城”之中。

必须承认，如今我们的社会是有些缺乏阳刚之气的，小男人多了，大丈夫少了。说具体些，男孩有点不像男孩了，男人有点不像男人了，各行各业都显露出阴盛阳衰的迹象。大学文科成了“女儿国”，奥运会女运动员撑起的不是“半边天”，媒体界的记者编辑几乎清一色“娘子军”。有人调侃说，除了党政等一二把手，男人全部退居二线。于是，有了男孩危机、男生危机，社会开始呼吁“拯救男孩”。据媒体报道，上海八中要联合华东师大建立男子中学来应付日益严重的“伪娘现象”。毫无疑问，没有阳刚之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阳刚之气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国家。

自不待言，代表阳刚之气的大丈夫并不等同于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比如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何等昂扬激越撼人魂魄的大丈夫境界。但岳飞不仅仅是武将，才气亦不让文人。上马横扫千军，气势直捣黄龙，下马提笔填词，留下千古绝唱。山东济南出身的辛弃疾也是如此，既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武勇之姿，又有“落日楼头断鸿声里”的文人咏叹。也就是说，“大丈夫”终究是一种情怀、一种精神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大丈夫”甚至可以和性别无关。有此境界，女性也可以是“大丈夫”；无此境界，男性也可以是小女人。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强力决定一切。社会美德让位给了个人私利，是非潜沉，公义不彰。

车夫的故事

□陈心想

【社会话题】

一百五十年前，那不勒斯，一个车夫被人暗算，花了好马的钱买了一匹劣质马。这匹劣质马不认路，只挑自己喜欢的路走，上坡时老摔跤，害怕爆竹和铃声，还曾被一群堵住路的绵羊绊倒过。车夫想到了一个保护他的黑手党，这个黑手党控制着马匹交易，向买主和卖主收取费用。靠着黑手党的保护，车夫上一年以一匹好马的价钱卖掉了一匹瞎马。可现在，那个保护人进了监狱。没了保护人的帮助，车夫只能买下这四匹劣马。最后车夫感叹称赞保护他的黑手党，“他真是个大人物。”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迪戈·甘姆贝塔在《黑手党：不信任的代价》一文里引用了这个故事。故事里的车夫看上去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他称赞黑手党让他以一匹好马的价钱卖了一匹瞎马，所以他真“伟大”。这个故事在正

常的社会里，乍看会令人吃惊，但还原到该车夫所处的社会背景里，似乎这种现象又很正常。

黑手党的兴起是因为权力的真空和普遍的不信任。根据帕顿的分析，那不勒斯之所以兴起黑手党，主要因为西班牙人统治下的分而治之的方法破坏了社会中的信任：从设法阻止商业发展和财富创造到操纵信息，从鼓励宗教迷信到以牺牲双方平等的团结为代价去建立垂直的服从和利用关系等等。但是，这种社会之所以能够一代代存活下来另有原因。甘姆贝塔认为，首先是因为缺乏有效可信的司法和执法力量，其次是不信任的普遍性导致经济贸易的不可预测性。

“每个人都知道，西西里人不相信政府；对超过群体界限之外的人，他们也不信任。”由于经济落后，又关闭了多数

公民发挥才干、表现良好行为的渠道，导致“一个人能为他的行为或野心确立的唯一目标就是超过他的同伴”。西西里谚语“同行是冤家”很能显示这种关系。由于没有值得信赖的中央政府，便不能够产生良好的市场竞争——不是要战胜对手，而是要伤害对手。这就是黑手党的行为，“宝座”不断易主，“彼可取而代之”。

“西西里舆论倾向于把黑手党视为能以私人方式解决公共正义的人。”当然这种“公义”是在黑手党控制范围内的事情。车夫相信有了黑手党保护人，就可以解决以好马价钱买劣质马的“不义”问题。这种信任也正是对“政府司法”不信任的反应。据说在西西里，发生偷盗时，如果求助于警方，75%的情况是无所作为，15%能找到罪犯，只有10%能

追回赃物；如果寻求黑手党帮助，只有5%没有成功。所以，对于个体来说，要么移民到其他地方，免受其害，要么顺应这种环境，投靠保护人。这是一个个体理性和集体非理性的困境。在这种困境里，车夫才会赞叹他的黑手党保护人真的伟大，心甘情愿付保护费。也正是在这种困境中，没有一个黑手党愿意凭借自己的力量来组建民主政府，因为政府信任是给每个人的，属于公共物品，不再为私人占有，更不能作为商品来出售。

对一个黑手党而言，提供的信任范围扩大了，“就很难检查受保护的卖主的所有交易，如果劣质货背着他进行交易，他的名誉会受损。”作为公共物品的信任，是一个秩序良好富有美德的社会必需的。车夫故事里的黑手党的信任只在群体内，而且是以私人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为代价的。而

只有通过坚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同社会的人才能够相互信任。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群体外”的也被当做“群体内”的来看待。信任是作为公共物品和社会美德呈现出来的，与之相伴的是经济繁荣。难怪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有本关于信任的经典著作，书名就是《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强力决定一切。社会美德让位给了个人私利，是非潜沉，公义不彰。车夫的故事，也是黑手党一再提醒人们的：没有他的保护只能受骗。普遍的不信任和被垄断的“有限责任”，这似乎就是南部意大利贫穷落后的原因所在。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